

是事实与历史的编织，更是想象与理想的实现

——我们为什么要翻译《宝库山世界历史研究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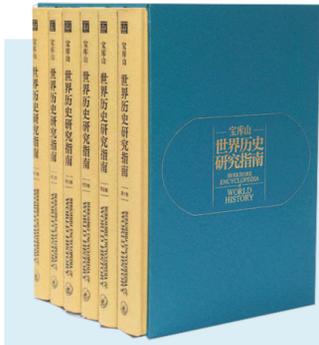
■ 陈恒

《宝库山世界历史研究指南》(六卷,陈恒、俞金尧、刘健、郭子林、黄艳红、刘文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出版,以下简称《指南》)中译本的出版,终于结束了叶芝所说的那种“责任始自梦中”的忧郁状态,虽然“责任”一词显得过于严肃与凝重,但毕竟亦可以理解为一个小小的愿景。

为什么会选这套书呢?为什么会引进《宝库山世界历史研究指南》(原书名《宝库山世界历史百科全书》)呢?为什么会花费如此精力来做这件事呢?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问题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个问题在近代世界五百年显得尤其重要。近代五百年有很多标志性的事件,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分水岭,但是18世纪启蒙运动在我看来是这五百年中最重要的一百年,是关键的一百年。这一百年当中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与事,但其中两件令人无法忘却:一件是1769年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引发了工业革命,可以说是西方开启了全面征服自然的历史;一件是1751年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主编《百科全书》的出版,促进了启蒙,这个出版对人类的影响怎么夸都不为过。但是我想其长久意义在于它开启了对欧洲民众的近代教化。

我记得202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百科全书》序言,取名为《启蒙运动的纲领》(徐前进译,简称《纲领》),很短的一本,对整个《百科全书》做了高度概括。这个序言为《百科全书》第一卷的序言,由达朗贝尔撰写,因为这一篇宏论,奠定了他在学术史上非常重要的地位。达朗贝尔进行了一次了不起的尝试,他试图对当代知识提出统一的想法,追溯其各个分支的发展和相互关系,并说明它们是如何构成一个单一结构的连贯部分的(《大英百科全书》语),特别是将科学的各个分支联系起来而引起了广泛的赞誉。

1963年,该纲领的英译者理查德·施瓦布在序言中罗列了这样几段赞美的话,值得在这里引用。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盛赞达朗贝尔的这个纲领:“你给了我极大的乐趣。我反复阅读了您的《纲领》。它富有力量,富有魅力,又很精确;思想比文字更丰富,情感同样丰富——我还可以继续赞美下去。”腓特烈大帝赞道:“许多人打了胜仗,征服了省份”,“但很少有人能写出像《纲领》这样完美的作品。”“人类无限完美”思想的主要提出者孔多塞毫不掩饰地歌颂这个序言:“广博的知识,只有天才才有的看待科学的方式,清晰、高尚、充满活力的文风,既有主题所要求的严谨,又有主题



《宝库山世界历史研究指南》
[美]威廉·H·麦克尼尔 主编
陈恒 俞金尧 刘健 郭子林 黄艳红 刘文明 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所允许的辛辣,这些因素的结合使《纲领》成为每个世纪最多只有两三部作品能够完成的无价之宝。”达朗贝尔本人也认为“在写这部作品时,我的每一行都是为了后代者想的”(达朗贝尔致德芳夫人,1752年2月22日)。

我在这里之所以引用这些故事,因为自那以后,百科全书不仅是试图涵盖所有领域的一般性知识汇编,而且也可以是旨在全面覆盖某一特定领域的专业性系统知识,更重要的是百科全书的编者有一种内在的价值诉求与理想表达。这就是我们翻译《指南》这部书的根本原因。该书现已出了两版,第一版是2005年,第二版是2010年,今天大家看到的中文译本第二版。麦克尼尔认为他主编这套书是“我们要成为教导自己的人”,他编这本书就是给美国人看的,他要告诉美国人世界是什么样的,历史是什么样的,未来可能是什么样的。麦克尼尔也因此获奖,在2010年白官颁奖仪式上,奥巴马总统将国家人文科学奖章授予他,获奖的理由是“(他)扩展了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

网络化已经解决了知识的基本框架,并可快速获得,因此,今天的百科全书不是大而全,不是面面俱到,而是前沿的条目、能影响学术发展的条目、能表达学术理念的条目,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回归,考察历史的关键问题、关键概念。麦克尼尔认为“写作、研究世界史的

这套百科全书可以让中国读者比以往更容易、更多地加入世界史的讨论氛围中。我欢迎中文版读者,希望并相信我们的相遇将为所有相关方带来丰硕的成果。

本书的编者与作者专长不同,观点各异,但他们创造这些文本的目的是为了体现世界范围内的知识网络和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些知识和问题将我们大家联系在一起。

我们将努力为您介绍孔子和儒家思想,以及作为古老而杰出的中国学问传统的继承者——中国历代王朝的历史,以及随后的革命政权更迭——孙中山、国民党、共产党,以及使今日中国如此强大的改革开放经济政策。

但是,我们也邀请你们看看世界其他地方——非洲、欧洲、美洲、澳大利亚和海洋上的岛屿以及海洋本身——它们曾经是一道屏障,但在1500年之后变成了最宽广的交汇之路。因为世界是圆的,人类的交流网络是全球性的,在许多方面也是瞬时的,而且越来越强烈地影响着每个人、每个地方。

因此,我们需要了解自己和他人的很多事情,阅读下面的文章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选择先看看我写给不了解中国的美国读者关于中国的内容;那么,我欢迎你们从亲身经历中批评我的言论。其他人可能希望看看其他作者写的关于美国和美利坚帝国的文章。但还有数以百计的其他文章可供探讨和评价。我们要成为教导自己的人。

这样一套百科全书的优势在于,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的声音,就像训练有素的合唱团一样和谐。而让他们和谐一致、保持同一音调的,是对理性、知识和真理的信仰——就易犯错误的人类而言,是要追求这些理想的。

最后,再次欢迎大家参加这场学习的盛宴;愿你们每一个人都加入这支合唱队,在你所能及的范围内与我们其他人一起合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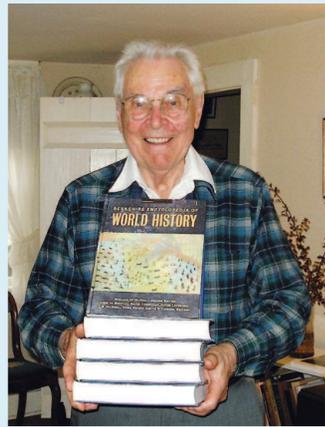
(本文为威廉·H·麦克尼尔主编《宝库山世界历史研究指南》中文版自序,陈恒译,题目为编者多中心)

国和美利坚帝国的文章。但还有数以百计的其他文章可供探讨和评价。我们要成为教导自己的人。

这样一套百科全书的优势在于,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的声音,就像训练有素的合唱团一样和谐。而让他们和谐一致、保持同一音调的,是对理性、知识和真理的信仰——就易犯错误的人类而言,是要追求这些理想的。

最后,再次欢迎大家参加这场学习的盛宴;愿你们每一个人都加入这支合唱队,在你所能及的范围内与我们其他人一起合唱。

(本文为威廉·H·麦克尼尔主编《宝库山世界历史研究指南》中文版自序,陈恒译,题目为编者多中心)



威廉·H·麦克尼尔

独一妙法尚未出现,以后也永不会出现,因为有着不同遗产、不同地域情况的不同民族肯定会继续保持彼此不同的态势,哪怕全球化在以后的时代持续进行并得到强化”,因此他致力于从“世界史的视角”观察全球互动、全球联系,条目的入选总是尽力展示该主题与其他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并记录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该书的577个条目,都是按照这个指导思想选出来的,这就是当代美国对整个全球史的认识。这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如果读者想这里寻找整个人类发展所有的人物与事件,那是不可能。主编把这577个条目设计了34个主题,来展示世界历史的人类之网,而且又可以按照通常的英文字母顺序检索找到相关重要的东西,这种编写方式已成为当代百科全书的主流模式。

我们寻找整个人类发展所有的人物与事件,那是不可能。主编把这577个条目设计了34个主题,来展示世界历史的人类之网,而且又可以按照通常的英文字母顺序检索找到相关重要的东西,这种编写方式已成为当代百科全书的主流模式。我们寻找整个人类发展所有的人物与事件,那是不可能。主编把这577个条目设计了34个主题,来展示世界历史的人类之网,而且又可以按照通常的英文字母顺序检索找到相关重要的东西,这种编写方式已成为当代百科全书的主流模式。

网络化已经解决了知识的基本框架,并可快速获得,因此,今天的百科全书不是大而全,不是面面俱到,而是前沿的条目、能影响学术发展的条目、能表达学术理念的条目,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回归,考察历史的关键问题、关键概念。麦克尼尔认为“写作、研究世界史的

触、交流、冲突、融合。例如,“启蒙运动”是一个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主题,但作者也注意到“欧洲人与非欧洲人及其语言、宗教、政治实践之间的邂逅也从许多方面激励了启蒙思想家”,虽然启蒙运动几乎只是一个欧洲现象,但一个更大范围的世界也在启蒙思想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切都为所有其他有雄心成为真正全球性的世界历史百科全书的作品树立了标杆。

庞大知识体系的制作、构建者基本都是这个时代的引领者、未来的预见者。百科全书的编者所想到的不仅是给读者提供基本的知识,更想使此类工具书能成为重塑民族文化、拓展全球视野、培养理想人格的重要工具,是自主知识生产的重要标志。百科全书以其独特的编织知识体系的方式,可以让人窥见时代的精神风貌;百科全书的出版能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一个时代知识生产状况和一个时代学者的境界。因此,对条目的选择可以看出编者对自身的评价、对他者文明的想法以及他们对未来的期望。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看学术界是如何通过百科全书的编撰来实现其学术理想的。一个是1901—1906年间在美国用英文出版的12卷本《犹太百科全书》,这部首次全面收集有关犹太人历史、文学、哲学、宗教、礼仪等方面的著作“标志着自一个世纪以来欧洲犹太学术活动的顶峰。它也是一座金矿,蕴藏着

世纪之交犹太学者的态度、理想和关切”;“标志着学术霸权的衣钵已传到美国;尽管大部分的推动力和研究都源自欧洲,但《犹太百科全书》注定要在新世界完成”;“《犹太百科全书》提供了一个鼓舞人心的证明:当有远见和决心的人超越分歧,携手合作时,就能取得具有持久价值的成就”。另一个是两卷本《非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百科全书》(2008),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百科全书,全书约有1000个条目,深入介绍了非西方文化在科学、技术和医学方面的成就。编者的愿望就是通过“《百科全书》展示非西方科学家的巨大成就,拓展学者、教师和学生们的视野。愿我们未来的学生永远不要相信科学仅限于世界的一小部分”。西方内部已经认识到那种西方中心主义所带来的祸害,而且通过扎实的学术基础研究来证实、说明世界一直是多中心的,中心是一直在变动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独领风骚的时刻。

到今天为止,整个欧美,尤其是当代美国百科全书的编撰之发达、种类之丰富、学术之专业、编撰之细致,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个人认为百科全书的编撰是学科成熟的象征,是学科创新的引导,是学术基础队伍强大的信号,是学术话语权的权杖,是追求学术理想的标志。当代中国恰恰在这一点上未能与时俱进,甚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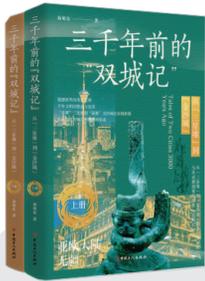
在某些方面不进反退。比如20世纪80年代上海就有三家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如今只剩一家。在当今新文科、三大体系建设、区域国别研究的现实需求下,自主的知识生产是每一个行业都不能回避的,所有学者都难以置身事外,因为哲学社会科学背后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百科全书编撰最能代表基础研究发达程度和未来的学术走向,需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形成更好的保障和激励,推动涌现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今天我们缺的不是简单的理论宣传,不是口号式的文章,缺少的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把基础学科、基础人才、基础队伍做好。这也是我选择这套百科全书的目的所在。

“虽然启蒙运动是由一群启蒙哲人构成的,但不止于此。它还是一种文化氛围,一种社会环境:启蒙哲人在其中活动,从中发出反叛的鼓噪,也从中悄悄地获得许多思想,同时还试图为之推行自己的改革纲领。”我们正处在这样的一个个可能出现的环境,我们期待新时代的文化氛围、社会环境、学术评估越来越好,这样就有可能营造出更多的具有世界级思想性的精品力作。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西方城市史)

吹沙见金“双城记”,得窥古蜀三千年

■ 王国平



《三千年前的“双城记”——从“三星堆”到“金沙城”》
易旭东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的突进式发展与史学考证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三星堆不断出土的各类精品文物,不断刷新着人们对巴蜀文明、长江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理解和认知。就在三星堆不断带给世人惊喜的同时,一部旨在“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从“三星堆”到“金沙城”历史时空的《三千年前的“双城记”——从“三星堆”到“金沙城”》于2023年底出版,再次因三星堆话题而带给读者新的惊喜。

该书分上下两册,涵括四个层次的逻辑演绎:遗址考古、文献钩沉、再现宏大的历史、观照鲜明的现实。围绕成都、重庆、武汉、杭州,以良渚、宝墩村、巫山古城、盘龙城、三星堆、金沙遗址文明为代表的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厘清、还原了从“巴蜀文化带”到“成渝经济圈”的演进脉络,系统再现形成过程中的“长江故事”与“兄弟城市对话”。学者汤继强认为该书讲述了中华文明传承千年的开放包容的特性,给“成渝双城”走向世界提供了坚实的史志支撑。

该书作者易旭东最仰慕的工匠,正是几千年前的古蜀先人们,在三星堆和金沙,他们可能使用着最简陋的工具,用最笨拙的方法,制作了无数美轮美奂的青铜神树、青铜立人像、金杖、纵目面

具、青铜持璋跪坐人像、青铜鸟面、青铜鸟头、青铜眼形器、玉璧、玉琮、玉戈、黄金面具、黄金太阳神鸟、商周铜虎、青铜鸟、青铜铃、蛙形金箔、青铜螺旋形器、青铜骑兽顶尊人像、龟背形网格状器……都是密布其中的工匠精神,经过李冰、诸葛亮、黄道婆,一路传承至今,也深刻影响着易旭东。对易旭东来说,这本书就是一部凝聚着他无数心血的匠心之作,初稿完成之后,他就像金沙的那些玉器师傅们一样,对每一个文字都仔细斟酌、反复打磨、精心雕琢。他写这本书,不仅是为了向世人养他的四川交卷,更是向那些古蜀工匠致敬。

因为工作原因,易旭东曾经多次参与过三星堆和金沙考古发掘的新闻报道。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当年考古现场的采访者成了巴蜀文明的钩沉者、梳理者、研究者和传播者。作为一名曾经的记者,他始终保持着新闻的敏锐触角。他发现,三星堆文明长期饱受争议,有些观点让人匪夷所思,而许多不负责任的“网文”火上浇油,三星堆真相隐晦之说甚嚣尘上,而金沙同样有着许多未解之谜……怎样才能还原三星堆和金沙的本来面貌?三星堆和金沙作为古代的双城,与今天的“成渝双城”又有怎样的时空呼应?书斋学者重视的是考证严谨的论述,而广大读者或许更愿意接受“冒热气”“沾泥土”“带露水”的文字。

于是,易旭东以“双城记”的视角,“采访”古籍史志,走访事件发生地,将史志事实与考古事实“融合”,深入挖掘成渝双城的特色文化符号,通过“情感体验、内心感悟、历史质询与真相推断”,让文物与艺术联动,将学术成果“通俗化”、远古历史“现代化”,写出了这本实验性和趣味性兼有的史志题材图书。就像《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奇妙关系一样,他这部用脚跑出来的作品堪称可读性很强的《古蜀演义》,最关键是,3000多年前的“巴蜀双城”与今天的“成渝双城”,虽然时空相隔,却彰显出非凡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今天成渝两地唱好“双城记”提供了更多

的启示与借鉴。

易旭东用自己独有的表达赋予了该书足够的文学性与想象力。他用鲜活的语言带领我们见山、见水、见人、见物、见城、见史,山是高大的蜀山,水是浩荡的蜀水,人是智慧的蜀人,物是精美的蜀物,城是古老的蜀城,史是神秘的蜀史。在他的笔下,铜树会开花,铜像会说话,金鸟会飞翔,金杖会舞蹈,象牙会唱歌,玉璋会弹琴,连那些斑驳的陶器都会在泥土里悄悄发芽……仅凭易旭东在书中那一句“三星堆人的眼睛,下雨了”,就让我引为文学上的知己。充盈字里行间的丰富想象不是无中生有,不是天马行空,更非痴心妄想,而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推测,是“思接千载,神游万里”的大胆假设。尽管三星堆和金沙的历史很遥远,身影很模糊,足迹很凌乱,但是大量的考古发现和专家们的科学论证,为易旭东在写作中展开想象的翅膀提供了足够的风力,也让易旭东的作品有了“立足巴蜀三千年,扶摇直上九万里”的想象空间。他的思绪从夏禹文化出发,沿着营盘山文化、宝墩文化、广汉文化一路前行,直至三星堆和金沙。其中不乏奇思妙想,但更多的是他把想象的小船放在历史长河里游弋,虽偶有偏离航道的旁逸斜出,但绝不会撇开河流,离堤万里。这也彰显出易旭东对历史题材书写的精准把控力。作家蒋蓝称易旭东为巴蜀史志与文学表现结合第一人,认为他在历史资料十分稀缺的现实情况下,巧妙复原了古蜀历史原态与人文空间,深具探索创新价值。

唐人刘禹锡词云:“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此句用在易旭东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徜徉于泥沙俱下的时间长河,历经千淘万漉,既寻到了历史的真金,又见到了岁月淹没下的三星堆和金沙古城中辉煌灿烂的黄金器具。而读者也从他的文字中吹沙见金,得窥古蜀的另一番面貌。

(本文为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4000年中国天文学史》
[法]让-马克·博奈-比多 著
李亮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古人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这是对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最高评价。可在现代以来,知识分子无需知道天文和地理,只能就人说话,就社会说社会。人凌驾于天地之上,人可以无视天地的存在了。这就导致百年以来我们对中国上古以来的天文学知识和理论知之甚少。

一年前,我读到一本法国物理学家让-马克·博奈-比多写的《4000年中国天文学史》,讲的是从夏朝以来中国人如何从天文方面获得启示而建立人文的事情,且多运用我们已有的天文考古知识,算是论证中国人的天文学吧,读来真的是别开生面。过去我也认真读过中国社科院冯至的《文明与科学》,讲的是中国上古时期的天文考古,同样也是讲的考古,同样也是想说明中国人的思想来自天上,同样用的也是科学方法,而且运用的材料非常丰富,但还是免不了令人觉得那是过去,无需再论证或怀念。读了法国科学家的这本书后,你会觉得中国人的思想如此别致,中国文化也并非我们百年以来讲的没有科学、没有逻辑。你会觉得还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一个非常奇怪的结论似乎在你的心里慢慢诞生:中国人的传统似乎往往需要外国人来发现。比如敦煌是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发现的,且后来成了世界显学;丝绸之路是德国人里希霍芬发现并命名的,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交流通道,英国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弗兰科·潘在本世纪以来又写了一本巨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再比如,当我们批判孔子和老子之时,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写了一本《大哲学家》,将孔子和老子称为轴心时期对人类作出伟大贡献的哲学

家,也是又一次从世界范围“发现”孔子和老子。现在,这个法国的物理学家又写了这本书,“发现”了中国的上古天文学和“天命”“天子”“天道”“天下”等中国文化中的核心概念,且是从科学的角度来阐释,以此来对古老的中国展开叙述。

三年疫情期间,我在研究司马迁的《天官书》和中国的“天道”这个概念时,几乎搜遍了学者写的天文学著作和翻译的外国学者的天文学著作。我看到,在古代,中国人的天文学是最发达的,且一直延续到现代,而欧洲人在基督教统治时期是禁止研究天文学的,直到文艺复兴以后又开始研究天文学。康德便是其中之一,他是从研究天文学开始转向哲学思考的。我还发现,欧洲人对天文学非常重视,在欧洲有两万多天文学爱好者,但中国人不太重视天文学,且中国的天文学爱好者几乎都是沿用西方的天文学,称之为现代天文学,隐含的意思是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持否定态度。

我断断续续学习了三年现代天文学,也对古代天文学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我们头顶上的星星还是那些星星,只不过西方人对此进行了重新命名。同时,西方古代的传统也是观星授时,与我们的一样,但许多人宁可觉得西方人是有道理的,我们是迷信。我还看到百年以来权威人士讲中国传统的十二属相和古代的星相术都是从西方来的,意思是我们古人也没有什么原创力。这些观点导致许多人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产生怀疑和否定,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持一种不信任态度。如此这般,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便异常艰难。

当我拿西方科学家写的这些著作,再对比司马迁的《天官书》时,便觉得豁然开朗。后来,我慢慢意识到,也许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性的方法论同样需要整个世界科学家和思想者的一次全新“发现”,用科学的方法把古老的镜子擦亮,以此来对中国上古世界的天文学、地理学以及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一次科学和人文的实证,那些迷信西方的人才学会反过来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我希望,中国学者能够有志气和勇气,也有足够的才气和底气,做擦亮中国传统文化古老镜子的第一人。与此同时,我也相信,我们五千年未断的古老文化会反过去解释整个世界那些解释不了的上古文化,到那时,中国文化可能就成为整个人类的显学和信任的文化。

对中国天文学的发现

■ 徐兆寿



徐兆寿,复旦大学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当代文艺评论》主编。